

华 民等 / 著

Zhongguo Jingji Jingzhengli de Guoji Maoyi Huanjing Yanjiu

中 国经济竞争力的国际 贸易环境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Zhongguo Jingji Jingzhengli de Guoji Maoyi Huanjing Yanjiu

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国际 贸易环境研究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国际贸易环境研究/华民等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9
(“985 工程”系列丛书)

ISBN 978-7-309-07186-3

I. 中… II. 华… III. 国际市场-市场竞争-研究-中国 IV. F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9195 号

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国际贸易环境研究

华 民 等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徐惠平 岑品杰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3 字数 214 千

201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186-3/F·1589

定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国际贸易环境的历史演变分析·····	(1)
第一节 国际贸易环境演变的原因解构·····	(1)
第二节 国际贸易环境演变的历程探析·····	(12)
第三节 结语：国际贸易环境历史演变的基本形态 ·····	(32)
参考文献·····	(33)
第二章 当今世界的国际贸易制度研究·····	(36)
第一节 引言·····	(36)
第二节 当今世界的国际贸易制度·····	(37)
第三节 世界贸易制度的现实陷阱·····	(48)
第四节 世界贸易制度的长期目标及中国的现实选择·····	(51)
参考文献·····	(54)
第三章 基于经济增长的人民币汇率选择·····	(56)
第一节 转型时期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迁·····	(56)
第二节 世界经济失衡环境下的人民币汇改：机遇和挑战 ·····	(61)
第三节 人民币升值带来了什么？ ·····	(66)
第四节 展望人民币未来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72)
附录：关于“非均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	(74)

第四章 国际贸易模式及其变化趋势的比较分析	(86)
第一节 基本背景.....	(86)
第二节 方法与数据.....	(88)
第三节 计量分析.....	(90)
第四节 主要结论与启示.....	(101)
参考文献.....	(102)
附录.....	(104)
第五章 电子商务的价值链重构效应与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调整	(108)
第一节 信息技术与商务革命.....	(109)
第二节 电子商务对企业价值链的整体影响.....	(112)
第三节 企业内部运作组织从“金字塔”模式向“扁平瘦”转化.....	(114)
第四节 电子商务与企业要素采购战略联盟.....	(115)
第五节 以产销互动与度身定制为特征的产品销售.....	(118)
第六节 电子商务时代企业从事跨国经营的规模经济优势.....	(120)
第七节 电子商务条件下企业跨国投资的内部化优势与区位 选择.....	(124)
第八节 电子商务增进企业跨国经营绩效的实证检验.....	(129)
第九节 结论与启示.....	(135)
参考文献.....	(136)
第六章 国际贸易的地区取向	(138)
第一节 引言.....	(138)
第二节 现象描述.....	(139)
第三节 理论框架与计量模型的设定.....	(145)
第四节 实证结果.....	(147)
第五节 结论.....	(149)
参考文献.....	(149)

第七章 国际贸易效应研究	(150)
第一节 国际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与收入分配效应.....	(150)
第二节 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溯源.....	(152)
第三节 国际贸易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溯源.....	(156)
第四节 国际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与收入分配效应的实证 观察与检验.....	(157)
第五节 近期国际贸易、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趋势观察	(160)
第六节 关于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一个 GMM 估计	(168)
第七节 关于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有条件相关的理论再思考.....	(173)
参考文献.....	(174)
附录.....	(177)
 第八章 贸易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国际比较	(179)
第一节 贸易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179)
第二节 贸易战略与贸易政策的类别及其演进历程.....	(180)
第三节 贸易战略与政策影响因素的国际比较.....	(184)
第四节 现代各国的贸易政策.....	(190)
参考文献.....	(192)
 第九章 结语：关于中国贸易发展战略的思考	(194)

第一章 国际贸易环境的历史演变分析

国际贸易环境的基本内涵包括国际贸易条件、国际贸易制度、国际贸易方式、国际贸易结构、国际贸易效应和国际贸易战略与政策等。所有这些因素都深刻地影响着国际贸易的形态,是开展国际贸易的外部条件制约。而从历史角度来探讨国际贸易环境的演进,则更能丰富我们研究的时空感,在了解其形成缘由、演化路径的基础上,对当今的国际贸易环境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所以,在本章我们就将从国际贸易环境演变的原因、国际贸易环境演变的历程与特点等多个角度,对国际贸易环境的历史演变展开分析。

第一节 国际贸易环境演变的原因解构

经济利益必然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因而受到特别重视。各国赖以形成和成长的条件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各国都变成了独具特性的个体;每个国家既同其他国家保持着相互往来,又过着其独特的生活(豪斯赫尔,1987,第230页)。而国际贸易环境就是国与国之间展开经济联系的最基本存在网络。

一、推动贸易展开的基本动力

按照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见解,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有赖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市场的深化和扩展。换句话说,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说到底与市场的深化和扩展是一回事。从市场自发扩展的内在机制来说,市场交易是任何文明社会经济增长、人们收入增加以及生活水平提高的原初动因和主要达致路径。市场交易源自分工,并会反过来促进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则受市场规模大小的限制。市场扩大会加速和深化劳动分工,从而经济增长与市场的深化和扩展实际上构成了

一枚硬币的两面。这种劳动分工和市场扩展的相互促进,就构成了任何社会经济成长的“斯密动力”(韦森,2006,第65页)。

那么市场交易本身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实际上,在《国富论》第二章,斯密对此曾有一些理论猜测,即把它归结为人类所禀有的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相互交易的倾向(propensity)。斯密(Smith, 1776/1930, p15)说:“尽管人类的智慧能预察到分工会产生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但衍生出这么多益处的劳动分工,却原本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它必定是不以这种广大效用为目的的一种人类某种倾向所非常缓慢和逐渐生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以及相互交易。”接着,斯密还深刻地指出:“这种倾向,是不是一种不能进一步分析的人类天性中本有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是理性和言语能力的必然结果,这不属于我们现在的研究范围。”尽管如此,斯密还是发现,“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在其他动物中是找不到的”,并且,这种天生的本能可能与人的语言能力有关(韦森,2006,第70页)。

显然人类的这种贸易禀赋是不会仅仅局限于一国之内的,随着经济活动范围和能力的不断扩大,跨国界的贸易形态同样早早地就出现了。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的过程、要素补充和市场扩张的欲望,尤其是各个国家非对称、不同步发展的事实,都直接决定了国际贸易的外部环境形态,并通过贸易的福利分配纽带,深刻影响着参与其间的各个主权国家的发展路径。

从动态角度看,空间意义上的贸易环境扩张还具有两个重要特征:其一,国际经济中心是在地域上不断转移的。正如迈克尔·波特所说,“从国家的层面来考虑时,‘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波特,2002,第1页)。荷兰、英国和美国凭借高人一筹的劳动生产率,各自在不同时期先后承担过世界经济乃至国际贸易中心的角色。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经济中心的职能还有点类似于宇宙中的“黑洞”——“一个不能逃逸到远处的事件集合”(霍金,2003,第128页),具有极大的能量、辐射性和吸纳力,但却会随着内部累积温度的不断升高而使自身质量下降,积聚能力逐渐衰减,甚至消亡。

其二,中心地区扩张性的资本积累和再生产,需要不断从外围地区获得投入和补充,通过“空间填补”(spatial fix)的方式软化内在的体制性矛盾(Chase-Dunn, 1989, p87)。所谓的“空间填补”,是指资本为寻求积累,转移到

反对和约束更小的新的空间去发展的趋向。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扩张随着对新市场、廉价投入品(包括劳动力)以及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的追求而展开。这样一种空间广度上的延伸和技术深度上——新产品和服务模式的开发——的拓展结合在一起,通过全球范围的资本循环,不断地把新的地域组合进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中去,使世界经济尤其是国际贸易的传统竞争秩序始终面临新的挑战(陆寒寅,2005,第23页)。

在现代社会以前,处于产业周期低级状态的人类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每个经济体仍然无力向外扩散,而只能在一个相对闭合的空间中内向型地发展。但即便如此,推进人类生存的贸易机动力量也从来没有缺失过,只是大陆帝国所依赖的机动力量是马和骆驼,而海洋帝国所倚重的是船只(麦金德,1985,第57页)。随时间推移,人类经济、生产能力不断提高,活动的空间范围也在趋于膨胀,经济发展的无序度随之上升,也即处于不同空间点位国家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在加大。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则通过跨国界的商品交换和生产组合,利用处于不同发展时序和区位国家的比较优势,将无序的经济世界重新纳入有序的世界经济结构之中。并且,国际贸易环境的形式和内容,也都将依赖于各个不同阶段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理论趋向,以及国家之间的相对发展差异而不断发生变化。

二、理论及意识形态发展

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同样受到理论演进的推动,对于国际贸易问题的系统性探讨应该是从重商主义开始的。在中世纪晚期重商主义理念兴盛之前,由于商品贸易和经济往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扮演主要角色,因此对于贸易问题的思考也大多是零星的。在西方社会,这样的思考主要表现为对于宗教教义和道德伦理的附庸,逐利行为本身是受人唾弃的;而东方社会“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秩序,甚至更长久地从意识形态领域压制着贸易和其他各种类型商业行为的发展。

进入中世纪晚期以后,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深入、理性启蒙运动的开展和主权国家意识的觉醒,贸易(尤其是跨国界的长距离贸易)与财富增长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引起大家的关注。当时人们的直观感受是贸易可以换得货币,而

跨国贸易更是可以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存量。“人们日益强调财富的生产而非其道德性分配。贸易与高利贷的道德含义是中世纪的经院派的主要的论题。然而,依据新出现的观点,经济财富是贸易与制成品的函数。由米塞登与孟首创的诸如假设的国际收支逆差的问题,已被日益作为由实际经济因素——出口与进口的差额,而非道德腐败的影响(后者被马利内斯、麦迪森及其他人强调为货币投机者的罪恶功绩)引起的结果来处理。按照哈钦森的第二个标准,这种渐进的变迁,已由对经济的功能性特征日益增加的兴趣而显现。故随着时间的演进,经济已被感知为一种机械性的设置。”(马格努松,2001,第9页)

作为工业革命的理论准备之一,古典经济学的诞生完全改变了人们对于贸易功能的理解,其两位著名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最早在批判重商主义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由贸易的理论。在他们的理论中,劳动是最主要的生产投入,因此,他们认为产品的成本由劳动生产率决定,而劳动生产率又由生产技术决定。斯密和李嘉图建立了以技术差异来解释贸易基础的古典贸易模型,并且无论是斯密的绝对优势模型,还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模型,都毫无疑问地认为贸易将给双方参与国带来福利增进。

从古典经济学开始,对国际贸易的研究就不再局限于怎样进行贸易,而开始对贸易产生的原因、结果以及与之相应的政策进行分析。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到20世纪的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俄林(Bertil Ohlin),再到当代的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琼斯(Renold Jones)、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经济学家们从各种角度,在各个方面对国际贸易的理论与政策进行分析论证,可以说方法越来越精细、手段越来越严密、演绎越来越完整、视角越来越全面。但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过程中有两个特点是引人注目的:其一,对于自由贸易福利效应的肯定是基本共通的——这在古典经济学中就得到了坚持;其二,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幼稚性产业的战略性贸易保护也得到了相应的论证和支持——关于这点,刚刚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保罗·克鲁格曼无疑是其中的代表性学者。而在之后国际贸易环境的变迁中,也的确真实地反映了这些理论内涵和各个主权国家经济利益结合的特点,成为前

者的重要解释变量。

三、国际贸易与货币体系安排

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也是和各个不同阶段国际性的贸易体系和货币体系安排密切相关的,它们直接影响着国际贸易的成本、数量及运行特点。

(一) 15 世纪以前的农耕经济时代

在 15 世纪前的农耕经济时代,由于统一而完整的世界性贸易体系并没有形成,因此相应的贸易和货币制度也是缺失的,而决定贸易数量和内容的主要因素,就落在了当时参与贸易的各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和货币信用度之上。例如,“古典时期,欧亚大陆商路两端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的存在,促进了贸易的全面发展。相反,这些帝国的崩溃,则破坏并削弱了这种贸易。不过,中世纪时期,伊斯兰教帝国和蒙古帝国的相继出现,又使这一贸易再度兴盛,并达到了新的高度”(斯塔夫里阿诺斯,2007,第 168 页)。客观上,进入中世纪以后先后出现的这些庞大帝国不再像古代时期那样,仅仅占据着某些大河流域,或像古典时期那样拥有整块的地区,而是横亘好几个地区甚至是洲际,使欧亚大陆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国家政体的跨洲型发展,把原先散落的商贸往来更加紧密地联结起来。

同以后的时代一样,有信用的货币从远古开始就成了最好的支付手段和交易媒介。约公元前 700 年,小亚细亚西部的吕底亚人开始在贵金属块上加盖印戳以保证其质量和重量。不久,希腊各城邦又加以改进,铸造扁平的圆形硬币,在硬币的正反两面印上戳记。金币和银币为大规模的批发贸易或地区间的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铜币使农夫们可以出卖自己的产品而无需物物交换,使工匠们能以自己的劳动换取工资而不是食物。其最后结果,大大促进了各种商业,进而相应地促进了制造业和农业的发展,并使经济专业化随着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而全面深化。这时,廉价商品的制造者第一次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而小土地所有者则从自给性农业转向专门性农业,如在中国是种桑养蚕,在希腊是生产橄榄油和葡萄酒(斯塔夫里阿诺斯,2007,第 85 页)。

进入中世纪后,另一个欧洲著名城市佛罗伦萨的商业发展也很突出,尤其是货币信贷事业最为发达,这与它早在 1252 年就铸造且在以后的很长时间内

通行于西欧各地的一种名为佛洛林的金币不无相关。在14世纪,佛罗伦萨的许多大商号,除了从事东方商品的批发贸易之外,往往还同时经营票据、贷款、存款、委托和保险等多方面的业务,范围几乎遍及全欧洲,经济实力极为强大。

(二) 15世纪至18世纪晚期的重商主义时代

15世纪至18世纪晚期,是重商主义理念和政策盛行于西欧的时代。贵金属货币的广泛使用更加深了人们对于流通领域财富生成观的偏执固守,这个时期的国际贸易环境是以“以邻为壑”的零和竞争为特点的。重商主义成为一种国家存在的体现和经济管理的形式,它进一步加强了在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中所确定的原则,即单一主权国家被认为是国际政治的基本单元,并由此开始了一个由无限制主权的国家组成的、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斯塔夫里阿诺斯,2007,第397页)。由经济利益而引致的任何国际纠纷,在这个时代更多地不是通过谈判,而是通过战争来解决。西、荷、英、法等欧洲强国都曾经在全球范围内相互多次、长时进行交战,其目的是为了争夺更多殖民利益,当然也是为了保证更好的贸易得利。

托马斯·孟著述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被普遍视为重商主义的宣言。它系统地反映了重商主义尤其是晚期重商主义追求国际贸易入超的基本观点,认为“对外贸易的真正面目和价值……就是国王的大量收入,国家的荣誉……我们的王国的城墙,我们的财富的来源,我们的战争的命脉,我们的敌人所怕的对象”(孟,1996)。而实现这个政策目标的重要途径就是由各个主权政府所颁发的保护性贸易条例——如最有代表性的英国的《航海条例》,和各个获得授权的对外贸易垄断组织——特许公司。在1600年,这种类型的股份公司在英国有数十个,其中最著名的首推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荷兰则有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和1621年成立的荷兰西印度公司;法国在科尔贝时代也创立了一批同类的垄断特权型公司。它们相继成为英、荷、法进行海外扩张和殖民贸易的主要工具。

另一方面,中世纪晚期西欧的货币、银行和信用体系较之以前也已经大大地丰富和成熟了,成为国际贸易的润滑剂,并有效促进了近代贸易活动的发展。首先,伴随着金银货币存量的迅速增长,西欧国家大多实行了金银复本位制,即金铸币与银铸币同时流通,金银币之间既有官方规定的兑换比率,也有

由金银供求状况决定的市场比价。其次,在 14 世纪早期,银行已开始使用汇票,这是信用工具发展史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作为支付和融资手段,它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极大促进了地区之间贸易的发展。最后,1609 年时西欧甚至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清算中心——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这与荷兰当时的商业地位以及它与世界各地具有广泛贸易联系的事实是无法截然分开的。

(三) 18 世纪晚期至 19 世纪晚期的古典自由贸易时代

到 18 世纪的后半叶,真正意义上的洲际贸易已经首次出现在了人类历史上,可以说,第一次国际分工已经大规模地完成——世界正成为一个经济单位。南北美洲和东欧(与西伯利亚一起)生产原料,非洲提供人力,亚洲提供各种奢侈品,而西欧尤其是英国则指挥这些全球性活动,并开始着力投入于工业生产(斯塔夫里阿诺斯,2007,第 461 页)。而西欧的这根指挥棒之所以可以灵活运转,除了凭借强大的工业经济实力,以及超经济的坚船利炮和殖民政治作为基础以外,自由主义贸易政策和黄金本位货币体系更是成为两根重要支架。可以说这个阶段是以逐步解除对资本、劳动力和贸易流动的管制为特征的。随着 19 世纪的进展,这些流动把世界各国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A·G·肯伍德、A·L·洛法德,1998,第 17 页)。虽然我们难以估算相近的政策理念和稳定的货币本位到底增加了多少贸易量,但毫无疑问的是,贸易的摩擦和成本因此大幅降低。

首先,从贸易制度领域着眼,这种自由贸易运动在两个层面上发生。在国家层面上,它包括许多后来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民族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在国际层面上,它包括普遍采取自由贸易政策,这在 19 世纪第三个 25 年达到高峰,并且标志着 1800 年以前时期英国、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等殖民帝国发展起来的特权贸易集团制度和限制贸易特点的结束。在这两个层面上,自由贸易优势为有关地区间趋向更为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提供了理性基础(A·G·肯伍德、A·L·洛法德,1998,第 53 页)。

19 世纪的自由贸易主要是通过双边优惠贸易条约以及其中的最惠国待遇安排得以维持和扩散的,任何时候一项新条约生效,就会有一次全面的关税减免。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的十年间,欧洲经济几乎实现了完全的自

由贸易。它深刻影响着经济活动赖以运行的国际环境,甚至在德、法、意、美等重要的早期工业化国家都纷纷再次转向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之后的很长时间内,这种自由主义的氛围还多少存留于国际经济交往及互动之中。“特别是这些年里签订的许多贸易条约对外国人合法权利的确定,使贸易在一个私营商人和私人财产权利得到广泛条约网保证的世界里发展。简单地说,这些条约创造了一个稳定的世界环境,在这个世界里,商人自由来往,在国外组织投资,这几乎同在他们本国一样自由、安全。”(A·G·肯伍德、A·L·洛法德,1998,第61页)

其次,单一黄金本位的确立,以及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支付和清算体系的运行,成为19世纪下半期国际自由贸易环境的又一坚实支撑。“金银帮助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因为金银在自己的货币概念中已经预示着世界市场的存在”(转引自宋则行、樊亢,1998,第197页)。但由传统金银复本位制波动而对国际贸易产生的干扰却极大困扰了国际贸易本身。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集中在19世纪下半叶相继过渡到金本位制,成为世界市场形成和国际贸易便捷化的重要标志,使之能够在相对平稳的货币条件下推动国际贸易网络的扩大和联系的增强。同样也是从19世纪起,英国的主要银行都开始经营对外贸易的放款业务,并于大约19世纪中叶造就了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英镑实际上作为世界货币充当各国贸易结算的主要支付手段和外汇储备。

以英国领衔的古典自由贸易体系就这样进入了自己的黄金周期。一方面是工业化国家的自由贸易政策和黄金本位货币,而另一方面则是广大沦为殖民地的亚、非、拉国家无从设防的关税甚至是国政。因此,这个时期的国际贸易环境是相对宽松而自由的,其结果就是让我们看到了欧洲国家的出口贸易连续多年以10%以上的比率快速增长(参见图1-1)。

(四) 19世纪晚期至1945年:垄断竞争型的国际贸易体系

自由主义的国际贸易环境在经过20余年的蓬勃发展后,很快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贸易保护主义的阴影就由美、德开始逐渐回归国际经济舞台。工业化时代发展中国家贸易保护的观点首先是由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学者、政治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其著名的《制造业报告》中提出的,并由德国人李斯特通过《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进一步加以系统性完善。他们的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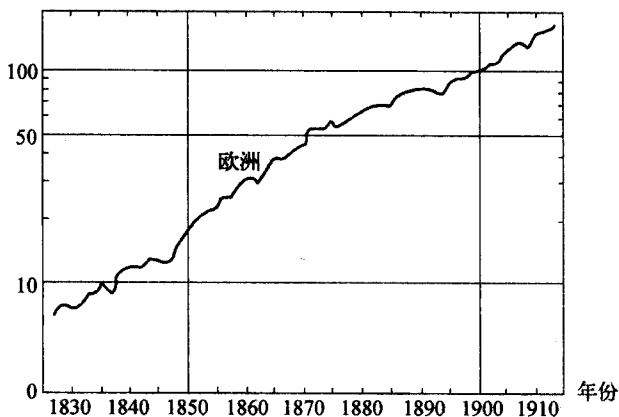


图 1-1 欧洲国家年出口总值指数(1899—1901=100)

资料来源：〔美〕龙多·卡梅伦：《世界经济史——从旧石器时代至今》，徐柏熏、徐正林译，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90 页。

本观点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和晚期（即在经济发展的商业化阶段和工业化阶段），自由贸易是有利的，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只有通过贸易保护政策才能完成。因此，后发展国家应提高幼稚工业的进口关税，目的是在一定时期内保护它们免受并非天生更有效率，而只是其发展更为先进的外国工业的竞争。

在这个过程中，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逐渐在各个国家获得了实施的空间。“农场主和工业家同样要求照顾，幼稚工业和受损农业的这种联合给贸易保护以最初刺激。一旦开始了，这种回归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就得到了民族主义深厚力量的支持和扶植。随着时间的流逝，压力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增长了，而且往往能够影响国会给予本利益集团以更大的贸易保护。贸易保护也趋向扩散到各个部门，因为对一个工业集团的让步使政府难以拒绝其他集团的类似要求。况且，从 19 世纪 90 年代起，税率越来越具有竞争性”（A·G·肯伍德、A·L·洛法德，1998，第 65—66 页）。首先是美国在内战之后就逐步提高关税，并于 1890 年的《麦金莱法案》中把平均税率提高到 50%；随后德国也在 19 世纪 70 年代末期由温和的关税保护一步步上升为深度关税保护；再后来法国、意大利、奥匈、俄国等也都纷纷效仿；只有那些极端依赖对

外贸易生存的国家,如英国、荷兰、丹麦等,才等到更晚一些的时候改变贸易政策。并且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危机期间,由于供给过剩和市场萧条而导致了报复性关税战的进一步升级(参见表 1-1)。

表 1-1 欧洲国家的关税率(1913=100)

国 别	食 品		半 成 品		制 成 品	
	1927	1931	1927	1931	1927	1931
德 国	125	380	95	153	190	183
法 国	65.5	180	96	125	153	178
意 大 利	75	188	114	198	193	286
比 利 时	46	93	138	204	122	137
瑞 士	146	288	157	208	189	236
瑞 典	117	208	107	106	475	605
罗马尼亚	131	253	105	153	190	215
保加利亚	320	540	204	270	385	465
西 班 牙	109	193	150	190	143	177

资料来源:赖普曼:《欧洲的关税水平与经济一体化》,转引自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中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97 页。

总之,关税税率的普遍大幅提高、贸易数量限制的广泛运用,以及由贸易条约所传导的大国间竞争性贸易保护的扩散,共同构成了整个 20 世纪上半叶世界贸易复兴的严重障碍,也成为当时国际贸易环境的基本特征。

这种以贸易保护为先导的经济民族主义同样扩散到货币政策领域,表现为金本位制的动摇、崩溃,以及随后发生的外汇倾销和多国货币集团分立。依据传统黄金本位制的准则,各国基本失去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依附于外部平衡和固定汇率。但进入 20 世纪之后,尽管人们仍然推崇金本位机制,但国家独立控制国内货币供应的愿望逐渐排挤了战前的国际金本位原则,而主张授予中央银行以控制国内货币供应的权力,政府倾向于使国家货币制度不受国际因素的影响(A·G·肯伍德、A·L·洛法德,1998,第 175 页),这毫无疑问地已经动摇了传统国际经济机制借以运行的各种基础和信念。

一旦金本位制动摇,那么利用本国货币贬值以暂时提高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做法也就不期而至了。尤其是 20 世纪 30 年代金本位制彻底崩溃以后,许多国家曾利用时机实行过大规模外汇倾销,展开激烈的贸易战,冲击并争夺世界市场。1936 年 9 月,美、英、法三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企图恢复国际货币秩序,还达成过“三国货币协定”。按照协定,三国同意维持协定订立时的汇价,尽量不再实行货币贬值,并共同合作来保持货币关系的稳定。但最后的执行效果也是乏善可陈,并没有真正缓和国际性的关税战、贸易战、货币战乃至资源争夺战。二战之前美元、英镑、法郎、马克和日元等集团的多极并立之势,最鲜明地反映了这个时代垄断竞争型的国际贸易环境特点。

(五) 二战后至今:全球经济时代以美国为主导的多元、混合竞争型模式

二战后以美、英为首的战胜国在总结二三十年代混乱经济秩序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谈判,分别以关贸总协定(GATT)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石,重新确立了国际贸易及国际货币的主体性制度架构,构建了战后较之前更为有序且组织化的国际贸易环境。

首先,1947 年 10 月《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签订,从本质上说标志着以减税为核心的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的起端。总协定签署后所举行的前 7 轮减税谈判使 6 万个税目的关税税率降低,涉及的商品占世界贸易额的一半以上。由此开始,加上 1968 年普惠制的实行以及 1975 年《洛美协定》的签订等因素,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税税率逐级降低,使得战前的高壁垒、关税战状况获得极大改观。而且,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讨论、协商和解决国际贸易问题的良好沟通平台,加强了国际间的贸易协调,是对战前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突破。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内含两个重要的指导原则:其一是国际贸易的多边和非歧视性原则,它是通过包括在该准则中的最惠国条款来实现的,根据最惠国条款,禁止签署旨在使一国受益而使其他国家受损的特惠贸易协定;其二是谴责贸易数量限制的原则。通过这些原则,GATT 希望传达的贸易思想是:各签约国有进入其贸易伙伴国市场的合法权利,作为回报,它也要为外国出口者提供同样的进入本国市场的机会。这样,由于所有国家都享有公正的贸易关系,世界贸易将迅速扩张(A·G·肯伍德、A·L·洛法德,1998,第 239